

邓正来 主编

世界社会科学 高级讲坛讲演录

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



第一辑



商务印书馆

世界社会科学 高级讲坛讲演录 (第一辑)

邓正来 主编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讲演录(第一辑)/邓正来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ISBN 978-7-100-06939-7

I. 世… II. 邓…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演讲—世界—选集
IV. C53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309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讲演录(第一辑)

邓正来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6939-7

2010年5月第1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1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1 1/4

定价: 25.00 元

“知识转型”：引进来与走出去

——《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讲演录》序

邓正来^{*}

—

如果我们回顾中国社会科学百年“知识引进运动”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相对明晰的阶段：（1）可以上溯自 19 世纪并延续至今的“引进”阶段，我们引进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等，在翻译大量社会科学文献的同时，也在中国建立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2）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的“复制”阶段，即开始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解释中国问题，“复制”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模式，这在经济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3）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国际接轨”阶段，即开始与国际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学科体

* 邓正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主编、*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主编、《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主编、《复旦政治哲学评论》主编。

系和学术建制等全面接轨,其主要的表现是 90 年代中期开始的学术规范化运动。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我们不仅大规模地引进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而且也初步建构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并开始“复制”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模式,在学术规范等方面开始同国际“接轨”。但必须看到:以“引进”、“复制”和“接轨”为特征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共同点在于以西方社会科学的判断标准作为我们的判断标准,而在这种判断标准下的研究成果不仅在较深的层面上忽视了对中国本身的理论关注,实际上也很难与西方进行实质性的交流和对话。另一方面,中国这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各种西方模式和传统模式的束缚,但中国社会科学却仍然受苏联以及西方某些思想文化的束缚,无法自主地解释当下实践中的中国经验本身。用一种形象的说法来讲就是,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很多时候其实是在帮着西方的先哲同中国的先哲们打仗。但是,帮着打仗的“我们”其实是不存在的:由于欠缺对生活于其间的当下中国的理论关切,“我们”事实上只是相对于西方论者们的“复印机”或“留声机”而已。在根本的意义上讲,我们在这些年中严重地忽视了对中国问题本身的深度研究和理论关注。^①

从共时性的视角来看,当下如火如荼的全球化进程为中国

^① 参见拙文:“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载《社会科学战线》2009 年第 5 期;“高等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载 2008 年 12 月 17 日《文汇报》。

社会科学赋予了一项新的时代使命,即参与全球化时代的“话语争夺”。经由系统研究,我认为,无论是从全球化本身的性质还是从西方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予以支配的性质来看,中国社会科学在贡献中国据以参与话语争夺、型构和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及方向的“理想图景”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因为只要我们建构起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我们就可以将参与修改世界结构之规则的资格转化为修改世界结构之规则的能力,并基于中国立场型构和影响全球化的进程与方向,而中国社会科学在贡献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方面则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第一,从全球化本身的性质来看,如果我们采取“问题化的进路”将全球化本身问题化,而不是前瞻性地将其看做是某种必然性的、客观存在的现实或过程,我们才可能洞见全球化与全球性,特别是全球主义的关系,洞见潜隐于全球化进程背后的话语斗争,甚至“文明冲突”实质,进而洞见一种服务于“主体性中国”的开放性全球化观。^①这是因为:“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一元化的同质性进程,也不是一个只有客观维度的发展进程,更不是一个绝对正确的甚或是正确本身的历史进程”,而“是一个可以根据人之认识或利益或传统被建构或被重构的博弈进程,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偶然且可能是一个可逆且不确定的过程”。^② 第二,中国经加

① 参见拙著:《谁之全球化? 何种法哲学? ——开放性全球化观与中国法律哲学建构论纲》,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260 页。

② 同上书,第 155、179 页。

人 WTO 等国际组织而被“裹挟”进全球化进程后,西方对中国的支配实质是一种“基于承诺的支配”,而这种支配性质的变化则意味着:只要我们拥有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我们就可能在承诺遵守全球化规则的同时根据基于中国立场的“理想图景”而修改全球化的运行规则,进而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方向。^① 显而易见,作为一国的“思想库”和“智力库”,中国社会科学理应在贡献出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方面作出我们责无旁贷的贡献。

因此,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正处于百年来的临界时刻: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引进”、“复制”、“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知识转型”的新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对话的阶段。这种“知识转型”在根本上要求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主动介入全球化时代话语权的争夺。这是全球化时代所赋予中国社会科学的使命!

二

坦率地讲,“知识转型”不仅是 we 创立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的一个主要背景,更是我们设

^① 参见拙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9—15 页;《谁之全球化? 何种法哲学? ——开放性全球化观与中国法律哲学建构论纲》,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181—193 页。

计和开展高研院各种学术活动的一个主要依据。除了其他品牌性活动(如“重新发现中国论坛”、“通业青年讲坛”、“学术午餐会”、“‘小南湖’跨学科读书会”、“中国深度研究学术工作坊”,以及“暑期社会科学高级讲习班”和“暑期社会科学高级学术翻译班”等)外,我们还设立了两个常规性的品牌讲坛:“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和“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并将其作为重中之重予以建设。

之所以设立这两个不同主题的讲坛,这与我们对“知识转型”,特别是对中国社会科学在“知识转型”时代的两项具体使命的理解密切相关。在我看来,中国学术在“知识转型”时代中必须实现这样一种根本性的转换,即从“思想中国”向“思想中国的根据”进行思想层面的转换。作为这个时代的学术人,我们必须根据对这种世界结构中的中国本身的分析和解释,对中国的“身份”和未来命运予以智识性的关注与思考,而这需要我们以一种认真且平实的态度去面对所有理论资源。因此,我认为,处于“知识转型”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着两项具体使命:第一项使命是继续“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同时对包括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内的所有的经典理论进行批判性地检视。第二项使命是开展对当代中国的深度理论研究,并使这种研究走向世界——当然,我所讲的“当代中国”并不是一个绝缘于世界结构与历史传统的“中国”,而是有待我们运用各种理论资源予以认知并建构的一个伦理性的文明体:首先,它是“关系中的中国”,即处于世界结构之中的中国;其次,它又是“历史中的中国”,即有着文明记忆、历史传统和后发经验的中国。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上述两项使命在表面上是分立的,但两者在根本上又是相互勾连在一起的。就对待西方理论资源的态度而言,我所主张的是以中国为思想根据的“个殊化”研究路径,亦即一种以研究者对于“中国”当下情势的“问题化”处理为根据而对西方法律哲学家的思想进行逐个分析与批判的研究路径——尽管这种思想根据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以一种隐微的方式发挥作用的。^①就中国研究的路径而言,我主张的又是一种对当下中国情势的“问题化理论处理”路径,亦即以“中国”为思想根据,运用包括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资源在内的所有理论资源对“中国”当下情势进行“问题化理论处理”。因此,我相信:只要我们同时完成这两项使命,我们不仅可以对包括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资源在内的所有理论资源有更为系统、深入的了解,而且又能以中国为思想根据利用这些理论资源对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等进行理论建构,进而以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对全球化的方向和世界秩序的性质发言,推动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

显而易见,“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是我们基于对上述第一项使命的认识而专门设立的。关于这项使命的认识,一如上述,也就是有关我们应当继续“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继续对所有经典理论进行批判性检视的主张。这里需要强调指出

^① 参见拙文:“回归经典 个别阅读——《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总序”,载《学术界》2007年第1期。

的是,这种认识乃是以明确反对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西学的如下几项既有的或潜在的误识为前提的:第一,明确反对那种以“国情”、“意识形态”等为借口而否定引进和研究“西学”之必要性的论调。这乃是因为不仅我们奉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和表征,而且就认识世界结构中的当下中国而言,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仍是我们的重要理论参照之一。第二,明确反对那种以呼唤“中国主体性”为借口而出现的所谓“知识引进运动终结论”。现代社会科学主要是在西方产生的。相对西方而言,中国社会科学不仅仍处于整体落后的局面,而且就对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世界体系、世界结构和“主体性中国”等问题的认识而言,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仍是我们全球化的世界结构下呼唤“主体性中国”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第三,明确反对那种“非语境化”和“前反思性”地对待西学的态度。就前者而言,我们不仅将西方论者的思想抽离于其所产生其间的特定时空以及各种物理性或主观性因素的影响,而且只记住某种思想的关键词、大而化之的说法,完全不了解其复杂的知识脉络、理论前设和内在理路等;就后者而言,中国论者仍在很大程度上毫无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论框架,这种倾向不仅实际上给西方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论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的“暴力”意义,而且还会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所做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进而使得这些研究成果都不得不带上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由此可见,尽管我们百年来的确已经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经典论著,但我们今天仍停留在介绍和传播的阶段,而根

本没有进入研究、批判和对话的阶段。

正是为了加强我们对包括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内的既有理论资源的了解和研究,提升中国社会科学整体理论水平,我们设立了“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这一讲坛设有严格的讲坛规则,不仅要求主讲人提前一周上交正式讲稿,而且每次邀请两位评论人对所讲论题深有研究的学者进行评论。我们希望,通过邀请世界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名学者进行主讲、评论与提问相结合的讲演,把该讲坛既建成中国社会科学界将世界社会科学理论“引进来”的最重要平台,也建成提升中国社会科学整体理论水平、加强中国社会科学进行实质性国际学术交流的一个最重要的互动平台!

三

自2008年9月25日开坛至2009年6月26日,“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已开讲18次。具体情况如下:

1. 2008年9月25日,世界著名人类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创始委员马歇尔·萨林斯主讲《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文化与人性》;

2. 2008年10月21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创始委员周其仁主讲《货币的教训——美国次贷危机对思想的影响》;

3. 2008年11月26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亚

洲研究所主任、历史系教授、高研院特聘讲座教授王国斌主讲《从历史与比较的视角看中国的社会关系与政治转型》;

4. 2008年12月9日,法律与发展学派奠基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Voss-Bascom 法学教授、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创始委员戴维·M. 特鲁贝克主讲《发展型国家与法律秩序——浅析一种发展与法律的新政治经济学》;

5. 2009年1月5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哲学研究所所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创始委员童世骏主讲《西方哲学研究的思想风险及其规避可能》;

6. 2009年2月24日,The Coimbra Group 名誉主席、德国耶拿大学校长、政治学教授、复旦大学名誉教授克劳斯·迪克主讲《德国的纪念文化与弗里德里希·席勒的世界性遗产》;

7. 2009年2月27日,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高研院兼职教授陈来主讲《情性与礼义——荀子政治哲学的人性公理》;

8. 2009年3月17日,“WTO之父”、美国乔治敦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院院长、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创始委员约翰·H. 杰克逊主讲《变化中的国际法制度——WTO 与中国》;

9. 2009年3月30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创始委员王斯福主讲《文明的概念与中国的文明》;

10. 2009年4月13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高研院学术顾问汤一介主讲《寻求文化

中的“普世价值”》；

11. 2009年4月23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高研院院刊《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学术委员会委员邓晓芒主讲《论“自我”的自欺本质》；

12. 2009年4月29日，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创始委员俞吾金主讲《启蒙的缺失与重建——对当前中国文化的思考》；

13. 2009年5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高研院双聘教授周国平主讲《尼采对现代文化的批判》；

14. 2009年5月25日，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高研院双聘教授陈嘉映主讲《谈谈语言转向》；

15. 2009年6月3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创始委员王缉思主讲《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回顾与展望》；

16. 2009年6月15日，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前任美国农业部长丹·格利克曼主讲《创意之道——电影推动世界经济与外交》；

17. 2009年6月15日，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高研院学术顾问朱维铮主讲《帝制中国的黄昏——满清在19世纪》；

18. 2009年6月26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复旦大学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创始委员张文显主讲《中国司法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以人民法院的改革为基点》。

除了周国平、王缉思和丹·格利克曼三位先生的讲稿因主

题等原因暂时不宜发表而没有收入本书外,其他 15 篇都悉数收录。在此,我想对马歇尔·萨林斯、周其仁、王国斌、戴卫·M. 特鲁贝克、童世骏、克劳斯·狄克、陈来、约翰·H. 杰克逊、王斯福、汤一介、邓晓芒、俞吾金、周国平、陈嘉映、王缉思、丹·格利克曼、朱维铮和张文显 18 位主讲人表示最诚挚的感谢。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作为主讲人为我们带来了思想砥砺的机会,更是因为所有的主讲人都是无报酬的——本讲坛只负责基本的食宿和差旅费,而不设任何讲课费。我也想对那些参与本讲坛演讲评论的广大学者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们的评论文字虽然没有收录在本讲演录中,但是他们睿智的、深刻的、具有严格学术批判意义的评论,为本讲坛得以进行深度互动和学术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我也想对直接负责这 18 场讲演组织和联络工作以及为整理和编辑本讲演录所付出辛劳努力的王勇、陈晔、黄倩、孙国东、沈映涵等高研院成员和李新安、王升平、龚智慧等同学致以谢意,没有他们的努力工作,这些讲演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最后,借此机会,我还想对一年来支持高研院学术事业的复旦大学领导和各位学界同仁、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没有你们的大力支持,高研院的点滴发展都是难以想象的!

2009 年 10 月 11 日于上海北郊三一斋

“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开坛致辞

(2008年9月25日)

秦绍德^{*}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首先，我代表学校，欢迎萨林斯教授访问复旦大学，祝愿您在复旦度过愉快的时光。

我和萨林斯教授今天有很多的相似性。例如，我们来此的缘由相同，都是被邓正来教授邀请来的；我们来此的目的也相似，都是为了支持“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正式开坛。我和萨林斯教授也有不同的地方。今晚，大家对我们的期望不同，期望我讲得越短越好，期望萨林斯教授讲得越长越好。

为了满足大家的期望，我只讲三句话。

第一，学校将一如既往地努力，支持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支持世界的社会科学走进中国，使真理越辩越明，使复旦的学术更加繁荣。请萨林斯教授转告您的同行，复旦热情地邀请他们来访问讲学，我们有热情的教授和聪明的学生。

第二，学校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的文科学者从事开拓性

^{*} 秦绍德，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顾问。

的学术工作,并尽全力为教授们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我在这里作一个简要的预告,由邓正来教授领衔的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将于年内正式挂牌成立。学校将同时聘请邓先生担任《复旦外文学报》(*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的主编,《复旦外文学报》将于2009年初正式发刊。

第三,希望邓正来教授和复旦师生一起努力,把“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越办越红火。我期待着这个讲坛成长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有影响力的高水平论坛之一。

最后,祝大家度过一个充实愉快的学术夜晚。

谢谢!

目 录

马歇尔·萨林斯 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 文化与人性	1
周其仁 货币的教训 ——美国次贷危机对思想的影响	20
王国斌 从历史与比较的视角看中国的社会关系和 政治转型	35
戴维·M. 特鲁贝克 发展型国家与法律秩序 ——浅析一种发展与法律的新政治经济学	55
童世骏 西方哲学研究的思想风险及其规避可能	94
克劳斯·迪克 德国的纪念文化与弗里德里希·席勒 的世界性遗产	121
陈来 情性与礼义 ——荀子政治哲学的人性公理	138
约翰·H. 杰克逊 变化中的国际法制度 ——WTO 与中国	169
王斯福 文明的概念与中国的文明	187
汤一介 寻求文化中的“普世价值”	215
邓晓芒 论“自我”的自欺本质	229